

从“人的解放”到“人的投资”：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转化

郭若群

乐山市行政学院 四川 乐山 614000

【摘要】：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核心旨归，旨在超越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使人摆脱对物的依附而获得自由个性。新时代我国“投资于人”的提出，并非对这一经典理论的简单套用，而是其在当代中国实践场域的创造性转化。“投资于人”将人的发展从理想目标聚焦为可操作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了“人的解放”从价值理想到制度实践、“人的发展”从抽象范畴到具体政策、“人的本质”从异化批判到主体建构的三重转化。

【关键词】：人的解放；投资于人；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

DOI:10.12417/3041-0630.26.09.039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最高价值追求。《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至今仍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理论灯塔。“投资于人”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从“人的解放”到“人的投资”，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根本立场，又回应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既延续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又探索了将其转化为制度实践的现实路径。

1 “人的解放”的理论内涵与时代张力

1.1 “人成为人”是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理论出发点，是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认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这意味着，人的存在和发展在其本质上应当是全面的——人不仅通过劳动改造客观世界，也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自身多方面的能力和丰富的个性。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劳动者被异化为“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人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而非目的。马克思将这一现象称为“绝对的矛盾”——生产力的发展本应为人提供解放的条件，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加剧了人的片面化发展。

人的解放，正是要超越这种异化状态。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将经历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自由解放是同一历史

进程的不同方面。

1.2 解放话语转化为发展实践的时代张力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理论底色决定了“解放”是其主导话语形态。然而，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这一经典理论面临着如何从“批判范式”转向“建设范式”的课题。

一方面，解放的历史任务尚未终结。只要资本逻辑仍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社会生活，只要劳动异化的现象仍然存在，人的解放就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当代我国正处于从“物的积累”向“人的发展”跃升的关键阶段。新时代以来，物质基础的极大丰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破除以往纯聚焦于“物”的投资模式，需要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人物结合”。

另一方面，解放的实现需要现实的条件和路径。马克思强调，“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而任务的解决“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投资于人”作为新的战略理念应运而生。它既延续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的根本关怀，又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发展路径。这种转化不是对经典理论的背离，而是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发展。

1.3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时代化命题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从“人的解放”到“人的投资”的话语演进，折射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在当代中国所经历的深刻时代化过程。

这一过程的核心命题在于：如何在坚守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价值的同时，将其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制度框架；如何在尊重资本运行规律的同时，引领资本助力人的发展；如何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保障发展成果切实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投资于人”正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为人类求解放”现实路径的理论创新。它既不回避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提升的客观要求，又将人的发展本身确立为投资的终极目的；既重视物质财富的创造积累，又强调“物”的投入必须服务于“人”的价值实现。这种辩证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深化与拓展。

2 “投资于人”对“人的解放”的三重时代转化

2.1 从价值理想到制度实践的实现形式转化

“人的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理想，在经典论述中更多地呈现为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而“投资于人”的独特贡献，在于将这一理想转化为可以制度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发展政策体系。

首先，“投资于人”的政策化标志着人的发展从抽象的价值倡导上升为具体的发展战略，意味着人的发展不再仅仅是理论上的应然目标，而是成为可衡量、可考核、可评估的政策实践。其次，“投资于人”打造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制度保障体系。如我国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建设契合需求的技能培训与终身学习机制，让全体人群享有优质教育资源；在民生保障上，实施生育补贴、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加强公共卫生保障、健全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推进等举措，紧扣“全生命周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持续制度支撑。再次，“投资于人”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协同支持体系。政府主导，强化制度供给与政策保障；市场机制参与人力资源开发，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力量精准进入民生短板领域，提供个性化服务与能力开发。这种多元协同格局让个人发展成为全社会共同事业，而非单一主体责任。

从价值理想到制度实践的转化，使“人的解放”获得了现实的操作路径。“投资于人”正是通过重构社会关系，将人的解放从理想图景转化为可感的现实。

2.2 从抽象范畴到具体政策的可操作化转化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中，“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而“投资于人”将其分解为教育、健康、技能、保障等具体政策领域，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

在教育领域，“投资于人”体现为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从夯实基础教育到

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每一项政策推进都以具体的资源投入，逐步拓展人发展自身能力的空间，推动人的能力全面发展。在健康领域，“投资于人”体现为不断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卫生保障体系，持续提升的全民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推进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筑牢健康根基。在社会保障领域，“投资于人”体现为逐步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网，从生育支持到养老保障，从就业扶持到困难群众兜底保障，不断降低人们发展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

这些具体的政策安排，把“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抽象的哲学命题，转化为一个个可落地、可推进、可检验的具体行动，让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真正融入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

2.3 从异化批判到主体建构的积极重构转化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核心在于揭示“异化”——人的本质力量在资本统治下成为与人对立的、奴役人的力量。而“投资于人”则超越了单纯的批判立场，通过制度创新消解异化的社会根源，使劳动者不再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人格化的劳动时间”，而是成为拥有发展权利和制度保障的主体。

一方面，“投资于人”通过赋能机制强化人的主体能力，它系统性、全周期地提升全民教育、职业技能、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增强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该战略将我国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才质量优势，加速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跃升。另一方面，“投资于人”在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建构人的主体性。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缓解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结构性不平等与社会排斥；健全民生保障体系，使个体摆脱生存焦虑，投入创造性劳动、社区参与和公共事务。这种个体价值与国家战略的融合，让个体在自我发展中强化社会联结，成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意义上完整的人。

从异化批判到主体建构的转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从“诊断”走向“治疗”的深刻转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

3 转化逻辑的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

3.1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历史性统一

“投资于人”的深层价值，在于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历史性统一。长期以来，关于人的发展的讨论往往陷入两种对立的立场：要么将人仅仅视为经济发展的工具，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么将人的价值绝对化，排斥任何功利性的考量。而“投资于人”则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

从工具理性层面看，“投资于人”确实回应了高质量发展

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迫切要求。当前我国数字化转型正经历“由技术驱动向人本驱动”的关键阶段,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持续为老年人提供智能设备使用培训,长期支持以农民工为主要对象的创业园区和返乡创业基地建设。这些举措既是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动适应,也是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的战略布局。从价值理性层面看,“投资于人”始终将人的发展本身作为目的。当教育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桥梁,当医疗保障成为守护生命尊严的屏障,当文化权益成为精神富足的源泉,“人”不再是抽象的概念符号,而是具体化为每个生命个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种制度设计超越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补救模式”,将人的发展确立为投资的终极价值归依。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这一命题的当代实践。“投资于人”的精髓就在于既承认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工具功能,又确保这种工具功能的发挥最终服务于人的价值实现。

3.2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学意蕴

“投资于人”的选择,深刻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投资于人”正是对这一论断的制度化落实。

与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造成“人的异化”与“主体边缘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都是围绕“人”这一核心展开,体现对人的各项权利的尊重与保障。而“投资于人”正是将这根本立场转化为可操作的资源配置方式,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人的能力提升创造条件;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立并巩固人的主体性地位;通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拓展人的发展空间。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制度安排,使“人的全面发展”不再仅仅是价值宣示,而是成为贯穿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各环节的实践逻辑。

“投资于人”实现了“物”的逻辑向“人”的逻辑的回归。与西方现代化对“物的依赖性”导致人的片面化发展不同。中

国式现代化始终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作为显著特征,使发展的逻辑真正复归于“人”本身。“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正是这一复归的制度表达。

3.3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探索

“投资于人”彰显出深远的历史洞察力。它既是对传统发展方式中“见物不见人”倾向的彻底扬弃,更是面向未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投资于人”正在创造新的历史辩证法。它既是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自觉遵循,又是对“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这一科学判断的时代印证。致力于人的发展潜能被充分激活,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新的发展实践不仅为破解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更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注入了鲜活的中国智慧。同时还证明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道路不仅可行,而且更具可持续性与文明包容性,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路径,开辟人类文明新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望:“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今天,中国正在通过“投资于人”的战略实践,朝着这个目标迈进。这条道路不仅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巨大贡献,更是在21世纪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有力证明。

4 结语

从“人的解放”到“人的投资”,话语形式的转变折射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深刻时代化进程。这一转化不是对经典理论的背离,而是其创造性发展的生动体现。“投资于人”的深层价值,在于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历史性统一,它将人的发展从理想目标转化为资源配置方式,从抽象范畴转化为具体政策,从异化批判转化为主体建构,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蓬勃生机。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4] 杨巧蓉.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新图景[N].光明日报,2025-09-01(15).
- [5] 李楠.“投资于人”对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价值意蕴[N].学习时报,2026-01-27(09).